**明清时期湖北省方志出版情况分析**

李思琪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 611756

内容摘要：明清两代是我国方志编纂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方志数量大，体例完备，内容广泛，具有综述性强、地域性明显、实用性强的特点。明清时期湖北省纂修的方志有三百余种，本文分通志和府县志两部分对这些方志做了分析，可以看出方志纂修情况与时间和地域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字：方志 明清 湖北省 出版

# 一、明清时期地方志的编修概况及特点

方志，是地方志的简称，是记载一个地方一定时期综合情况的志书。所谓一个地方，古代是指省、府、州、郡、县、镇、里、村等，现在是指省、市、地区、区、县、乡、镇、村等。所谓综合情况，是指这个地方的建置沿革、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社会、风俗、文化、军事等等。可以说方志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历朝历代的政府都把编纂地方志书作为一项重要的官府政事和文化事业。编纂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方志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先秦时代萌发纂辑舆图之作，秦汉时期方志渐具初期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是我国方志的形成阶段，隋唐五代的图经则是方志进一步形成和发展阶段，到了宋代，方志的体裁和体例日趋完备，元代之郡县又多以图经出现，明代纂修《大明一统志》标志着我国区域志从此定型[1]。明清两代是我国方志发展的繁荣时期。据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粗略统计，今存明代方志尚有近千种，其中不包括山、水、寺庙、名胜等志。若将此统计在内，将大大超过千种以上。从统计来看，在这近千种的明代方志中，嘉靖所修有三百四十种，万历所修三百五十八种[2][310]。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中总结了明代方志编修的三个特点。第一，编修方志更贯通古今、空发议论。第二，订立凡例以明著书之宗旨和原则。这是方志编修体例上的一个新贡献。明以前所修方志，今天所能看到的很少设有凡例，惟《淳祐玉峰志》有凡例五则，并且很剑三，仅在所写范围上立了几项原则，至于著书之宗旨则丝毫没有涉及，与明代凡例有很大区别[2][312]。通过凡例，可以使读者了解到一书编写的指导思想、著书宗旨以及编写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部书的质量和编纂者的水平。明代设有凡例的府州县志计有：《成华新昌县志》、《弘治抚州府志》、《正德大名府志》、《嘉靖六合县志》、《嘉靖沛县志》、《嘉靖宝应县志》、《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嘉靖安庆县志》、《嘉靖铜陵县志》、《嘉靖泾县志》、《嘉靖宁国府志》、《嘉靖漳平县志》、《嘉靖宁德县志》、《嘉靖濮州志》、《嘉靖罗田县志》、《嘉靖昆山县志》、《万历江浦县志》等。用凡例的形式，对于修志的体例、志书记载的内容范围、材料的搜集区取等重大问题进行议论，这是修志领域的新气象。第三，注意研究方志的性质，强调方志的性质。从明代所修方志的序和跋来看，志即史的看法占主导地位。而修志的目的在于资政，即要为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到了清代，地方志编修进入了鼎盛时期。清代方志的数量之巨大、体例之完备、内容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清朝统一局面出现以后，政治、经济上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局面，这就为方志的编修创造了条件。清朝统治者对方志的编修特别重视，通令全国各地编纂志书，方志编纂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视。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倡导，编修方志在全国蔚然成风，尤其是乾嘉时期，形成了举国上下编修方志的高潮。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方志共有八千余种，其中清代方志有五千余种，约占现存方志总数的80%，其中康熙、乾隆时期就分别编纂过一千三百九十种和一千五百四十种。清代方志可以按行政区划分为三个级，第一个是全国的“一统志”，第二个是地方性的“省志”，第三个是“县志”、“镇志”。关于方志的分类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志书所属的不同种类，在此基础上加以细致的区分。地方志书的分类，依照各种不同的标准，则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以往常用的志书分类法，主要有如下三种形式：一、按照记载的区域划分，可以分为总志、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道志、市志、乡镇志、卫所志、边关志、土司志等类别。这里所说的按照区域划分，主要指的是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其等级单位来进行的划分，我们现在所见的绝大部分旧方志，都是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进行划分的[3] 。这是地方志书本身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作为地方志书本身，其实就包含了按照地域进行区别划分的基本要素。上文对于清代方志的三级分类，就是按照此标准进行的。二、按照志书记载内容的广狭程度，又可以分为综合志书与专门志书两类。例如通志、总志等，记载的门类众多，综合性强；而山水志、寺观志、园林志等，则以特定的对象作为记载的中心，具有专门性。三、依照地方志书的篇章构架进行划分，则有平目体、纲目体等类别，这种划分重在突出志书的整体结构以及篇目之间的关系。以上三种，是常见的对地方志书进行文献分类的方法，特别是前面两种分类方法，是《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以及各图书馆系统地方志书目录、各地新编地方志书目录所依据的基本分类方法，具有广泛的影响，一直沿用至今。本文后节对于明清时期湖北省方志编修情况的分析就是以第一种分类方法为标准进行的。与历代方志相比，明清方志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第一，综述性强，地理信息更丰富。方志记述一定地域之内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代发展状况，记述内容涉及到各个学科。明清方志较以往方志在内容上更为全面，它记载有地理、政治、军事、教育、文化、学术、科技、社会生活、人物等，各门类严格编辑。第二，地域性比较明显。明清地方志均以一定区域为记载范围的，因其志书总类齐全，不仅有省、府、州、县、厅、市、旗、盟区、乡镇志，还有边关、卫所、山水、古迹、文献、经济、文化、旅游等各种专志，这就体现了更强的区域性特征。第三，实用性较强。在明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编修方志更注意这一点。

# 二、明清时期湖北省方志编修、出版概况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在夏殷以前，是南方民族聚居之地。殷、周属荆、豫二州。春秋属楚。宋时置湖北、京西二路。元设湖广行省。明因之，洪武湖北领武昌、黄州、荆州、襄阳、汉阳、德安六府，成化增设郧阳府，嘉靖增设承天府。清初置湖北省，改承天府为安陆府，雍正增设宜昌、施南二府，共辖十府。湖北方志之始，据张国淦所著《中国古方志考》，其著录最早者为后汉王粲的《荆州文学记官记》。张著收录元代以前湖北志书凡百二十九种。惜原书全部失传，其中偶有后人辑佚本。清《[宣统]湖北通志》录明、清湖北志书约五百部，虽不为全貌，亦足可证两代修志之盛。湖北现存志书，最早者是宋宝祐年间修的《寿昌乘》。旧方志中，除大多数以“志”为名外，还有一些是用别称的。黄苇先生在《地方志》一书中指出了“书”、“经”、“记”、“图经”、“录”、“传”、“略”、“乘”、“谱”、“考”、“集”、“编”、“簿”、“典”、“览”、“纪”、“识”、“鉴”、“赋”、“资”、“文献”、“疏”、“集载”、“会要”、“事情”、“概况”、“故”、“系”等二三十余种别称。中国地方志名称繁多，历朝历代各地普遍编修，同一省、府、州、县等的志书一般不止一种，而是数种，甚至几十种。《寿昌乘》原书已佚，今传本为情人文廷式自《永乐大典》辑出[4]。今所见传世最早版本的湖北志书，是明代《[正统]嘉鱼县志》三卷，莫震纂修，正统十四年（1449）刻。

根据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收录，现存历代湖北方志336种。200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北省志》附录一稿有《湖北省地方志目录》，著录湖北旧志387种。2012年，湖北省方志办又出版其所编《湖北省历代旧方志目录》。该书是在1981年版《湖北省旧方志目录》（后经修订收入《湖北省志·附录》）的基础上，由湖北各市（州）、县（市、区）地方志办公室提供资料，经省方志办进行校核整理、补充修订而成的。《湖北省旧方志目录》共著录1949年以前所编湖北省志、府县志、乡土志、专志等514种，所收按今行政区划编次，以反映湖北省历代旧志的版本及保存状况。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总目》及《湖北省旧方志目录》只收存世“地区志”不同，《湖北省历代旧方志目录》扩大了收录范围，不仅对“专志”加以选录，还就耳目所及收入了不少亡佚旧志以及有违体例不当收之书。根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湖北部分，海内外现存湖北旧方志336种。其中：属省志者十一种，府志三十九种，州志四十二种，县志二百二十四种，乡土志等二十种；宋修一种（存辑佚本），明修三十七种，清修二百七二种，民国修二十六种。由于历代累经变乱及各种原因，湖北方志失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宋、元以前所修，除得见个别辑佚本外，余皆失之。明清期间所修方志流传至今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孤本、残本，或仅有抄本、稿本传世。现流传仅存抄、稿本四十四种。共计一百一十六种，占去湖北流传方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还有多种海内孤本分散收藏在各图书馆里。如明代《[弘治]黄州府志》十卷，分存天一阁（卷一至卷五）和上海图书馆（卷六至卷十）两处。在《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湖北列目的三百三十六种志书中，湖北省图书馆现藏二百四十二种（包括复印本等），占百分之七十二，还缺藏九十四种，占百分之二十八。

湖北省志，始修于明，续修于清。明代省志，现仅存在正德和万历两种。明代湖北设八府，出武昌府外，另七府均有志书流传。其最早者：《黄州府志》有弘治十三年（1500）刻本；《德安府志》有正德十二年（1517）刻本；《襄阳府志》有正德十二年（1517）刻本；此前有《重刊襄阳郡志》天顺三年（1459）刻本；《荆州府志》有嘉靖十一年（1532）刻本；《汉阳府志》有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本；承天府有嘉靖间刻《承天大志》；《郧阳府志》有万历十六年（1588）刻本。《武昌府志》明修已佚。宜昌未升府前，有明弘治九年（1496）刻的《夷陵州志》传世。施州卫未升施南府前，明及清初修《施南卫志》均佚。湖北现存志书中，县志占去三分之二，且各县均有志书流传。[3]

据《明代方志考》的收录，明代湖北省范围内共编纂了三种通志。第一种是《湖广图经志书》，这是其明成化二十年（1484）湖广布政使司成立后第一次编修的省志，下限是正德十六年（1521）。第二种是《湖广通志》，有二十卷，于嘉靖元年（1522）由薛刚纂修，吴廷举续修。编纂人薛刚，山阴人，天顺八年进士，官至湖广提学副使，后志称“楚本无志，志之子刚始”。吴廷举，嘉鱼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曾任副都御使。明万历《湖广总志》条云：“统计湖广总志之书，始见有明正德间《湖广图经志书》，阙后有嘉靖元年薛刚之《通志》，吴廷举又为续修。”原《湖广图经志书》已佚，而《湖广通志》存有嘉靖刻本。《湖广通志》全书全国仅宁波天一阁藏有嘉靖刻本第一卷，南京图书馆有正德刊本二至二十卷，湖北省图书馆有抄本二卷至第十三卷。视此，该书全国只能凑齐全一部[6][4] 。关于嘉靖之前，湖广有无省志，其说法不一。章学诚在《前志列传叙例》中说：“前明有成化、嘉靖、万历三家志书”。又一说：“明正德年间有《湖广图经志书》一部。”宣统年间编修的《湖北通志》序中肯定万历前只有一部通志，情况是：薛刚是成化二十年编纂的《湖广图经志书》，而吴廷举是续于嘉靖元年，从成华二十年到嘉靖元年这三十七年有弘治十八年和正德十六年，都发生在薛刚修志以后的三十七年，而又在吴廷举续修以前。情况说明在这同一时期之内不会有另一部通志[6][5]。距上志五十五年后，出现了明代第三种通志《湖广总志》，全九十八卷，由徐学谟纂修，成书于万历四年（1576）。其书体例分为三十二门，上无总纲，下无子母，体裁简括。其反例云：“作志体裁，有挈以大纲，而中分群目者；有概括大略，而行事阙如者。故凡一篇总标纲领，即疏析事词，于下为目，不复于大纲三下又列小纲，惧嫌于复也。”可见次部通志体例与前志不同，它不是按行政区划分化而是以事类分辑三十二门，命曰总志。这种体例对以后修志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三部通志，明代湖北省编修的方志大量的还是府县志。据《明代方志考》的收录，明代武汉市编修了5种府县方志，黄石市编修了4种府县方志，襄樊市8种，十堰市3种，荆州市13种，宜昌市8种，荆门市3种，孝感市5种，黄冈市14种，咸宁市9种，随州市1种，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种，共计75种。

清代湖北省编修方志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明代。首先看省志，根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湖北省部分，清代湖北省编修了八种省志。第一种，康熙年间由徐国相、王新命修，宫梦仁、姚淳焘纂的《湖广通志》，共八十卷，现存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徐国相，字行清，辽东广宁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调升湖广总督。王新命，四川潼川人，康熙贡士，官擢湖广巡抚。宫梦仁，字定山，又字宗衮，秦州人，康熙五十七年进士，在湖北时任驿传盐法道副使。姚淳焘，字涉山，乌程人，康熙六年进士，湖广提学道副使。当康熙诏修《大清一统志》，从上至下均奉谕旨修地方志。第二种，雍正年间由迈柱等修，夏力恕、柯煜纂的《湖广通志》，共一百二十卷，现存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迈柱，辽宁人，雍正五年（1727）擢湖广总督，六年赴任。夏力恕，字观川，号浓农山人，湖北孝感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官翰林院编修，雍正二年主讲江汉书院。柯煜，字南陔，浙江嘉善人。雍正元年进士。雍正后，湖广分别设立布政司，政事实分两省。第三种，乾隆年间由章学诚纂的《湖北通志检存稿》，现有民国十一年（1922）《章氏遗书》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章氏遗书》本。第四种，乾隆年间由陈诗纂的《湖北旧闻录》，共四十六卷，现有1988年武汉出版社铅印本。第五种，嘉庆年间由吴熊光、百龄等修，陈诗等纂的《湖北通志》，共一百卷，现存嘉庆九年（1804）刻本。吴熊光，安徽休宁人，乾隆举人，嘉庆六年（1801）擢湖广总督，九年离任。百龄，辽东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嘉庆九年任湖广总督。陈诗，字观民，湖北蕲州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主讲江南书院。乾隆见毕沅延、章学诚纂《湖北通志》，未及刊布。嘉庆时，熊光复奏请修之，六年开局，九年付梓，是为湖北分修通志之始。第六种，光绪年间由洪良品纂辑的《湖北通志余》，共二十六卷，现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此书稿本两部，一为稿本二十二册，一为经过删定后之写请稿本八册，清稿本有1985年湖北省图书馆影印本。第七种，光绪年间由杨守敬纂的《湖北通志· 舆地志稿》，现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杨守敬清光绪四年手稿本。第八种，宣统年间由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的《湖北通志》，共一百七十二卷，现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商务印书馆缩印本。吕调元，江苏太湖人，民国三年（1914）任鄂省长官。刘承恩，湖北谷城人，民国七年继吕任。张仲炘，字次珊，湖北江夏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官至通政史参议。杨承禧，湖北江夏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官四川侯补道，民国四年续修《湖北通志》时任纂修帮总纂。此志的编纂情况几经波折，光绪六、七年间，首次志稿由彭祖贤等人修成后，数经讨论未果，后因内倾外乱而停；直到宣统元年，才聘请张仲炘等设局编纂。未及两年，清亡，志又停修。民国三年又将因清亡而逃居上海的张仲炘等请回湖北续纂。该志在反例中说：“本志续嘉庆志而作，凡三经其稿、初稿为光绪辛巳年（七年）截止光绪六年止，再修稿为宣统庚戍（二年）截至光绪十五年止，此次成稿截至宣统三年止，其在宣统三年以后事实概不登载”。以上七部清代湖北省通志有四部是已经刊行的：《[康熙]湖广通志》、《[雍正]湖广通志》、《[嘉庆]湖北通志》、《[宣统]湖北通志》。再来看府县志。根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湖北省部分，清代武汉市编修府县志26种，黄石市5种，襄樊市21种，荆门市4种，孝感地区22种，黄冈地区44种，咸宁地区26种，荆州地区43种，宜昌地区31种，郧阳地区21种，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0种，共计263种。

明清时期湖北方志，除通志部分，大量的还是府县志书。根据本文以上对于《明代方志考》、《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的考察，将明清时期湖北省府县志书的数量做成如下表：

|  |  |  |  |  |
| --- | --- | --- | --- | --- |
|  区域 |  合计 |  明 |  清 |  备注 |
|  武汉市 |  31 |  5 |  26 | 区域以现湖北省行政区划为标准。 |
|  孝感地区 |  27 |  5 |  22 |
|  黄冈地区 |  58 |  14 |  44 |
|  咸宁地区 |  35 |  9  |  26 |
| 黄石地区 |  9 |  4 |  5 |
|  荆州地区 |  63 |  16 |  47 |
|  宜昌地区 |  39 |  8 |  31 |
|  恩施地区 |  22 |  2 |  20 |
|  襄阳地区 |  29 |  8 |  21 |
|  随州地区 |  1 |  1 |  0 |
|  十堰地区 |  24 |  3  |  21  |
|  总计 |  338 |  75 |  263 |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从志书编纂的分布情况看，可以看出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发展与志书编纂情况有密切的关联。如荆州地区明清以来有近七十种地方志，几乎占全省的五分之一；黄冈、咸宁两个地区也多达五十余种，因为这些地区均沿长江，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文化相对发达。而相对偏远的山区如郧阳、恩施，方志数量则相对较少。第二，从时间上看，清代修的志书最多，近三百种，占湖北省旧志数量的绝大部分。可见清代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高于历代，也表明了随着历史的前进，志书编纂在发展。

1. **以明清郧阳府志为样本看明清湖北省方志的发展**

 明成化十二年（1476）析湖广襄阳府的属县而设置，即郧县、上津、房县、竹山4县置。郧阳府自明成化十二年（1476）迄清光绪三年（1877）止，计401年，修府志8次。第一部志是嘉靖年间纂修《湖广图经志书》中的《郧阳府专辑》。《湖广图经志书》20卷，卷一是藩司、桌司、都司、行都司，卷二至卷十九是十四府和四州，卷二十是施州卫，其中卷九是郧阳府专辑。郧阳府专辑内容分28类：舆图、建置沿革、形胜、风俗、山川、城池、坊乡、土产、户口、田赋、公署、学校、书院、宫室、惠政、关梁、铺舍、寺观、祠庙、坛址、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科甲、列女、诗文等。薛纲纂修时，户口、田赋等是成化八年（1472）的统计数据，吴廷举续修时添用正德七年（1512）的数据。吴志将薛志延续了40年。它是郧阳府建置前4年的和郧阳府成立后36年的数据，也包括正德初郧阳府志的数据。因此，《湖广图经志书》卷九《郧阳府专辑》28个门类的内容反映了郧阳府建置

初期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志为明万历《郧阳府志》。万历六年（1578）刻本，由郧阳抚治右副都御史徐学漠主修，襄土府纪书周绍程纂。万历《郧阳府志》共31卷，30门类，分为图经、郡纪、沿革、星野、城池、山川、形势、选举表、秩官表、公署、食货、物产、学校、风俗、兵政、祀典、关堡、津梁、水利、铺舍、古迹、丘墓、寺观、宦绩、人物、流寓、列女、仙释、杂记、艺文（分两卷）等。是志乃据正德《郧阳府志》及《郧县志》、《房县志》等增修而成。志中人物多见县志而未录。而正德旧志是郡、邑分别记载；万历府志则以郡为纲，以邑类附，较便观览，是该志写作表述的一大特点，为清代郧阳历次府志所模仿。该志每门类前有序，后有论，既有导读作用又揭小规律；是志前置郡纪，可谓今志的大事记，起到概述的作用。这些均反映出该志的记述特点。第三部《郧志类编》纂修于清康熙八年（1669），由郧阳别驾仇昌柞主修，郧阳拔贡李绍贤纂。《郧志类编》知府刘作霖作序，序云：郧志类编在明万历《郧阳府志》基础上，“以史为据”进行“校正、删补”，“上下万千年间，郧之事事尽此一书”。第四部是清康熙《湖广郧阳府志》，始修于康熙十九年（1680）。知府刘作森纂修，知府杨廷耀续成并刊刻。《湖广郧阳府志》共42卷，卷首为序占、图经，卷之一至卷之二十八分别为：总考、星野、城池、形势（附山水）、公署、秩官、学校、祠祀、风俗、兵政、物产、赋役、水利、铺舍、关堡、津梁、宦绩、选举、人物、忠孝、列女、褒封、古迹、仙释、陵墓、流寓、事记，卷之二十九至四十二为艺文，共13类，14卷：敕、赋、词、歌、诗、疏、序、记(上下)、碑、议、铭、文等。是志篇目各自为门类，不分纲目。门类表述特点，以郧府为总，分述属县。第五部为清康熙《郧阳府志补》。均州知州江闿康熙二十八年（1689）署郧阳府事，辑《郧阳府志》闭遗者为《郧阳府志补》。郧郡通判孙寅传云:“康熙二十八年，孙寅与署郧江闿娟俸延师(办学校)，士子无书籍者亦捐给之。第六部，清嘉庆《郧阳志》。《郧阳志》成于嘉庆二年（1797），知府王正常主修，重庆贡士谢攀云纂。嘉庆二年书成，凡得10卷，统计24万余占。嘉庆六年（1801 ），方山“以平白莲教功，擢襄阳道(下荆南道)，仍摄府事。去，郧人思之。”该志为10卷首一卷，卷一地理，卷二建置，卷三嗣祀，卷四田赋，卷五官师，卷六人物，卷七选举，卷八兵防，卷九祥异，卷十丛记。是志采用纲目体，卷志为纲，纲下列门目。与前志比较，是志星野、艺文不允门目，是排目表述中的一大特点，对其后同治版《郧阳志》有影响。第七部是清嘉庆《郧阳志补》，《郧阳志》刊印12年后，原主修王正常，又于嘉庆十四年（1809 ）纂《郧阳志补》一卷。第八部为清同治《郧阳志》， 《郧阳志》成书于同治九年（1870），光绪三年（1877）增刻本，为古代郧阳府最后修的府志。知府吴葆仪修，庆裕继修，王严恭纂。《郧阳志》计8卷及卷首，为纲目体。各志纲领门目如下：卷首是郧阳府及属县舆图，卷之一舆地志，领沿革及其表、疆域、形势、山川、关隘、古迹及陵墓、风俗等门目；卷之二建置志，领城池、公署及坊表、学校、里社、市集、铺递、津梁等门目；卷之三祠祀志，领祠祀及寺观；卷之四田赋志，领赋役、蠲政、税课、仓储、物产等门目；卷之五分上下，为官师志，上为官师志，下为宦绩；卷之六人物志分二，一为德行、忠义，二为选举、仕宦及封赠，三为列女、流寓；卷之七兵防志，领军制、兵事门目；卷之八丛纪志.领祥异、科录门目。若与嘉庆府志较比，同治府志将选举卷并入人物卷，祥异卷并入丛纪卷，故10卷变为8卷。并仿嘉庆府志不设星野和艺文两门类，将康熙府志艺文13个门类分载于其他各门类中，以充实其内涵。由明清时期郧阳府纂修的这八部方志来看，方志纂修的体例趋向完善。明清时期郧阳府第一部志书《湖广图经志书》中的《郧阳府专辑》分28类，明万历《郧阳府志》31卷30门类，分类比较零散，无统领之纲。到了清嘉庆《郧阳志》，共10卷，卷志为纲，纲下列门目，采用纲目体，较之前的体例来看更加清晰、完善。并且还可以看出从明到清，方志的内容得到了扩展和充实，可以称得上是某一地区的百科全书了。

 明清时期方志纂修的繁荣局面，是多方面条件下的结果。明清时期随着全国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统治阶级重视和提倡地方志的纂修，发布诏令，勤于审查和督促，各省、府、州、县都设立志局或志馆，请博学大儒和地方绅士参加修志。加之有质量上乘的宋、元、明时期纂修的方志作为基础，明清时期方志纂修的条件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明清时期纂修的方志资料充实、内容丰富，它以社会为中心，许多不详载于正史的，都凭方志保存下来了。这是留给今人的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江凌.试论明清方志的特点及其国土学价值[J].河南大学学报，2004(3):55.

[2]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方志出版社，2003:310.

[3]黄苇.方志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20.

[4]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下）[M].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4:17-1.

[5]徐孝宓、刘昌润主编.湖北省地方志考略[M].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8：9.

[6]徐孝宓 刘昌润主编.湖北省地方志考略[M].吉林省图书馆,1998：4.

附录：

一、明代湖北省方志目录

二、清代湖北省方志目录

**The analysis on publication status of Hubei’s local chroniclei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Si-qi

（Southwest Jiao Tong university，School of Humanities，2015201317）

**Abstract**: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ins is properou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During this period,the local chronicleins have large numbers,sound rules and extensive contents.The number of Hubei’s local chroniclei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over three hunderds.This paper analyses these local chronicleins through general annals and Fu county annals,from which we can see the publication status of Hubei’s local chroniclein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ime and region.

**Key words**：local chronicleins；Ming and Qing dynasties；Hubei province；publication status